



纪宝成

近现代以来,国学的性质曾被人地歪曲,国学教育与研究的历史就遭遇了生硬的割裂……必须承认,“国学”绝对不是只有其美、没有其恶的纯粹事物,我们既不能因它存有糟粕而一概抹杀它,但同样也不能因它今天仍拥有合理的内核而一味拔高它……

国学教育与国学热

■纪宝成

国学教育与研究是一个传统的主题,但也是一个全新的事业。说它是固有的、传统的,是因为国学始终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是传统文化与学术的高度凝练和集中体现;作为学科之学,国学是中国历代知识体系传承的载体、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研究内对象。借用《中庸》的话来描述,“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国学的特征与本质。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讲,国学教育又是一个全新的事业,众所周知,近现代以来,国学内性质曾被人地歪曲,国学的价值曾被人地贬斥,国学的地位曾被人地抹杀,这羊,国学教育与研究的历史就遭遇了生硬的割裂,它既导致了当代人文教育的严重缺失,也造成了新型人格培育的无底蕴。这中间的教训应该说是相当沉痛与深刻的。因此,重估国学的价值,在新时期推行国学教育、开展国学研究,显然是拨乱反正的全新事业。

我始终认为:在今天,堂堂正正地提倡开展国学教育与研究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需要,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营造中,国学是重要的纽带;在高等教育体制完善与健全的过程中,国学是重要的环节;在世界文明多元对话的开展中,国学是重要的平台。

回顾近些年来国学教育的成就,我认为它集中反映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国高校中,国学教育机构纷纷建立,国学教育的开展方兴未艾,蔚为大观。据不完全统计,已建立国学院、国学研究院,或以高等儒学研究院、书院等命名而以国学教育研究为主体的机构,已多达20余所,且有进一步递增的趋势。而昨天,西南大学还成立了重庆国学院。这样,就从组织机构健全层面,为更好地推动国学教育奠定了基础。



常纪文

为什么中国的肉类产品难以出口到欧美国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动物福利不过关。

对动物保护法的几点思考

■常纪文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利用动物同时也善待动物的传统。清末和民国时期我国有禁止残害动物的专门立法或者条款,民国还通过立法设立了专门的动物保护民间组织。

从2009年以来,动物保护立法就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特别是前段时间在天津发生的能动物大批死亡的事件,再次引发社会的谴责和立法讨论。

现在每年都发生一些重大的动物死亡事件,但却没有得到很好和及时的解决,动物保护的呼声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而且社会上广大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包括学生站出来支持加强动物保护立法。

我最早开始从事这方面研究是在2003年。2009年开始起草条文,2010年提出了条文。可喜的是,我们目前看到国家立法机关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国家林业局在去年出台了禁止动物园利用动物进行表演活动的文

件。在2010年中国动物保护法制度建设国际会议上,国家林业局来了五个领导参加。现在开会时,一些部门的领导还询问动物保护法的进展,所以说各方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只是立法涉及了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社会利益和民族传统等各方关系,一旦轻易地确定法律很可能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

从经济方面来看,中国是农产品生产大国,农村很多家庭都养着鸡鸭猪牛等家禽家畜,但中国的动物出口却很少。在欧洲大多只能看到中国的海产品,而中国的鸡肉牛肉基本无法出口,即使有一些出口产品,也大多供给了国外的华人超市。为什么中国的肉类产品难以出口到欧美国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动物福利不过关。

我国的经济总量如今在世界排名第二,经济发展了也要给动物一些人道主义关怀,应尽量给动物高标准的动物福利。前段时间

肯德基爆出丑闻,在欧洲,肯德基根本不敢这么做,只有在中国它才有机可乘,这说明我国的监管机构和制度仍需要完善。

中国的动物保护在很多有良知者的参与下,从2007年、2008年以来以奥运会为契机而获得加强,有两个标志性事件。第一,就是原定在鸟巢举办的斗牛比赛,由于中国动物保护组织的介入而取消了。第二,是加拿大的海豹产品进口。这两年,加拿大多次派官员到中国游说,推销海豹油等产品,在中国动物保护组织的介入下,也被搁置。

中国的动物保护现在是世界动物保护运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比较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动物保护必须在国家政治经济条件下有序开展,否则就有可能被视为“异类”。动物保护运动不能盲目开展,应该随着人类发展的趋势进行。

十八大报告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持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国学教育的基本对象与内容、国学教育的基本规律与方法的具体确立有待进一步制度化、科学化、国学学科属性上与文、史、哲等学科的联系以及区隔的合理说明有待进一步具体化、明晰化。如果不能妥善、合理地回应人们在这些方面存在的疑虑与困惑,推进新时期的国学教育很可能是劳而少功,事倍功半。而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我们则要努力处理好适当稳定与积极变革、国学核心内涵确定与外延边际模糊、尊重借鉴传统教育方法与运用创新当代教育手段等方面的关系,使新时期的国学教育沿着健康的道路顺利前进。

三是国学教育的观念与方法尚有进一步加以改进与完善的地方,如何科学、理性地传承和弘扬国学依然任重道远。“国学热”的勃兴,其意义的主流无疑是正面的、积极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难免存在急功近利的现象,而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的做法却未能被普遍倡导与积极践行,这样,就可能对国学“虚火”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国学教育的严肃性、庄重性。另外,国学如同其他事物一样,其内涵与价值也具有双重性,在新时期开展国学教育,同样有一个怎样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立场与方法的问题。

必须承认,“国学”绝对不是只有其美、没有其恶的纯粹事物,我们既不能因它存有糟粕而一概抹杀它,但同样也不能因它今天仍拥有合理的内核而一味拔高它。科学理性、一分为二永远是我们对待“国学”应有的立场与态度。在“国学热”蓬勃兴起的今天,我们对“国学”多一份冷静,多一点客观尤其显得重要。我认为,只有坚持这种科学理性的立场与态度,我们才能从容应对一部分人有关国学教育的种种质疑,牢牢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



廖资生

以科技支撑灾害防治工作

■廖资生

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深入细致,地质灾害应该具有较高的可预测性,山地地质灾害的防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也只有依靠科技力量的支撑才能搞好地质灾害的防治。

近年来,我国的山地地质灾害有逐渐增多、加强之势。究其原因:一是近年极端天气(降雨强度)频繁出现;二是人类活动加强破坏了山坡的稳定性;第三则是我们与对灾害防治的不力有关。

尽管党中央十分重视地质灾害的防治工作,但是全国特大地质灾害频发的局面仍未明显改观。

有人说,地质灾害和地震一样难以预测和防治。我认为这样的说法不妥。地震是由地壳深处地质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当事发前没有人们可观察到地震征兆时,的确难于预测。因此只能从建筑规划上“避让”或从增强建筑物结构的抗震性能上进行“防备”。而山地的地质灾害(如滑坡、泥石流、崩塌等),主要是与暴雨、冻融等气候因素,山地岩石的结构、构造,以及外力地质作用与人为活动与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有关。这些影响因素,除地震诱发因素外,多数是可以被我们认识和掌控的。

因此,只要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得深入细致,地质灾害应该具有较高的可预测性,也有相当多的防灾、减灾措施可供选择。但是地质灾害发生的机理是极其复杂的,影响因素更是多种多样的:有主导和非主导因素之分;有些因素的作用是缓慢、渐进的(如植被的破坏、坡脚河流的冲刷),而有一些因素则是突发、急剧的(如地震、暴雨、山洪、人工开挖);有些因素是人们可观察到的(如斜坡的岩石的破碎程度、岩层产出状态、坡体开裂、山体发出异响等),有些因素则是觉察不到的(如斜坡缓慢地变形、岩土含水量的增加和松动等)。因此山地地质灾害的防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也只有依靠科技力量的支撑才能搞好地质灾害的防治。

以科学发展观回顾我们在地质灾害防治方面所进行的工作,我们认为:我国政府以人为本、关爱民生,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在灾后救助和灾后重建方面取得了世人赞誉的巨大成绩。但是我们在灾害的预测预防方面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对重大地质灾害的预测预报水平不高。对多数的重大地质灾害未能在事发前作出准确的预报和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从而造成了不应该有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工程施工特别是县乡以下居民点的选址,没有把地质灾害的评估作为工程设计、施工的必需程序,或者没有评价,或者虽有评价但流于形式。因此一些建筑物选址不当,易遭灾害袭击;同时建筑物又未采取相应的抗灾措施,则更易造成损毁。

地质灾害防治的科技力量不足。市、县二级基本没有专业的地质灾害防治机构。从事这项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多,缺乏先进的勘察、监测设备,国家和地方在地质灾害的预测防治上投入专项经费也不足,因此无力对全国大面积山地开展地质灾害的详细勘察和预报预警工作。为此,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地质灾害条例》和2010年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通知》提出了分工负责灾害防治的原则。即:国土资源部门负责指导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和重大地质灾害的勘察与防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建设和管理单位负责治理因工程建设等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

对于国土面积广袤的中国来说,以上“条例”和“通知”提出的分工治理原则是正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各方面如何落实到行动上。从近年我国重大地质灾害发生的地域上看,城市、工矿集中区和铁道、公路、水利工程沿线,由于有专业的地质勘察队伍进行过地质灾害的评估和采取了相应的防治措施,地质灾害发生的几率相对较少;其所发生的地质灾害主要分布在对地质灾害治理尚不彻底的已建工程地段和某些地质灾害评估走过场的施工工地。近年发生最多、损失重大的地质灾害,绝大多数都在各级政府负责的广大农村。究其原因,作者认为主要是地方政府管辖范围太大,财力有限,无力在地质灾害的防治上投入所需的资金。因此绝大多数市、县没有设立专业的地质灾害防治机构,只能将灾害防治任务交由当地的国土资源局或水利局等部门兼管,或将此项任务下达给乡、镇政府,并实行“群测群防”的灾害防治对策。但是地质灾害的防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没有一支具备地质灾害防治专业知识、拥有先进勘察仪器设备的专业技术队伍进行深入细致的勘察、监测工作,仅靠“群测群防”和签订“灾害防治承包责任书”是难以胜任这一艰巨、复杂任务的。

我认为今后最重要的就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的科学技术支撑。

首先应在地质灾害多发区的县、市一级设立地质灾害防治的专门机构,并配备一批训练有素、拥有先进勘察、监测装备的技术人员。同时,为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的科学技术支撑,在有关高等学校应设置地质灾害防治专业,为国家培养所需要的灾害防治专业人才。在科学院的相关院所,设置地质灾害防治研究机构,国家科技基金委也应加大对地质灾害防治课题的支持力度。

(作者系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地下水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刘学俊

马克思曾经指出,文明如果是自发地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发展,则留给自己的是荒漠。对于人类来讲,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事业,而生态文明的建设将开启一个人类文明的新时代。

生态文明:开启人类新时代

■刘学俊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行为严重扰动了自然环境,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气候变暖,已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基于此,从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和思想,到2012年“里约+20”会议报告《我们期望的未来》正式启动有关可持续发展问题全球对话的20多年时间里,各国都认为,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共同性,使得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迎来一个可持续的未来。

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是具体的生态修复与建设,把它当成是国家和区域重要的基础设施,融入国家和区域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中;其二是把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经济建设融为一体,使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这就是在主体功能区中的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内,发挥比较优势,利用其巨大的生态资产优势,通过高科技和实用技术的有力支撑,加大其不可替代的极端条件下生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使之形成特色产业。这既可以保护和恢复当地之生态环境,也可以增加人民的收入,使当地经济获得发展。对于这些生态功能区来说,应该突破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相矛盾

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跨越国界。

其次,在许多情况下,生态建设、产业发展和经济建设是可以融为一体的,生态建设的过程同时就是产业发展的过程,或者,产业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生态建设的过程,走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之路。这就是在主体功能区中的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内,发挥比较优势,利用其巨大的生态资产优势,通过高科技和实用技术的有力支撑,加大其不可替代的极端条件下生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使之形成特色产业。这既可以保护和恢复当地之生态环境,也可以增加人民的收入,使当地经济获得发展。对于这些生态功能区来说,应该突破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相矛盾

的传统窠臼,利用自己的优势,通过生态产业的发展来改变传统的产业结构,也通过生态产业的发展来占据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进而实现地区经济的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它的前提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维护人类自身赖以生存发展的生态平衡。这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曾经指出,文明如果是自发地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发展,则留给自己的是荒漠。对于人类来讲,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事业,而生态文明的建设将开启一个人类文明的新时代。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教授)